

熊贤君 著

中国教育思想史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管理史

周谷城题

熊贤君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管理史

熊贤君著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崇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125字数390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622-0446-2/G·145

印数 1—4000 定价3.30元

序

邓宗琦

当今社会，国际性竞争异常激烈。这种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管理国家靠人才，管理经济靠人才，管理科技靠人才，管理教育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教育的成败得失，则在于教育管理。为了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各级各类人才，各国都在调整教育结构，完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阻碍人才成长、脱颖而出的管理措施和手段。因而这种竞争归根结蒂是教育管理的竞争。落后的教育管理，只能压制和摧残人才，减慢国家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速度；先进、科学的教育管理，不仅能培养出大批尖端人才，而且能充分调动他们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促进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为了在教育管理竞争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改革和完善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教育管理制度，我们不仅需要横向借鉴其他国家教育管理的经验教训，也需要纵向总结我国历史上教育管理的经验。列宁曾经号召无产阶级学会与资本家打交道，做生意，并叮嘱要舍得用重金交学费，向资本家学习管理。邓小平同志也曾告诫我们，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历史的经验，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使我们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97页）学习和借鉴我国历史上教育管理的理论、原则、制度、法规和措施中的可取之处，是有助于完善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

随着教育管理竞争的逐日加剧，它已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特征。教育管理已不再仅仅是教育管理部门的事情了。从胎儿教育到“老年教育”，都是教育管理的对象。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感觉到，胎儿教育、幼儿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回归教育、终身教育，渗透到全社会各部门、各阶层，一直深入到千家万户。这是一个大教育观。这些都是教育管理的对象与内容。毋庸置疑，管理在教育部门的全部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一门研究教育管理的原则、制度和办法，揭示教育管理规律的独立学科。教育管理对整个教育工作起着决策、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同人体的神经系统一般。因而，教育管理问题，必须引起重视。教育质量如何，效益高低，学校办得好坏与否，经费、师资、设备等固然重要，但是与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人员素质及教育管理方针、政策、措施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在教育经费、师资、设备等条件大体差不多的情况下，如果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其教育的质量、办学效益等就会明显不同。我们应认识到，管理好教育，办好学校，既是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的事情，也是各级各类学校领导人员以及全体教职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所以都应懂一点教育管理和教育管理史的基本知识。

鉴于以上几种原因，贤君同志撰写的《中国教育管理史》，是做了一项于社会甚有益处的工作。他耗费了几年时间，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入手，根据各个朝代史书、志书、野史及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著作中所吐露的教育管理信息，进而加以拓展和深化、挖掘和升华，并将历代教育宏观管理政策、教育管理原则、教育管理制度、选士制度（包括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以及教育管理思想联系起来考察，比较分析，阐发议论，说明原委，不乏真知灼见，为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育管理提供了材料和思路，更能给我们进行教育管理改革提供良多的启示和借鉴。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的确是这样，

了解了中国教育管理的历史，也就可以把握其现状，也可以大致推知它的发展趋势。所以，我认为《中国教育管理史》的问世，对于推动教育管理改革，对于培养新型人才，并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我国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是很有意义的。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外对中国教育管理史还未作过专门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因之在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档案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中间边缘地带，尚是无人垦殖的“处女地”。《中国教育管理史》算是为中国教育史、中国管理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空白。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中国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教育管理的完备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这本书的问世，也是有其自身的体系特点和价值的。

这本书稿，我粗略地看过两遍。贤君同志数易其稿，每一次修改都有较大的提高。这是一个青年教师、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向前艰难登攀的足迹。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对于这项新的研究成果，我是予以肯定的，愿向教育管理工作、广大教师、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及读者诸君推荐这本书，也热切希望中青年学者有更多的新颖、高水平之作问世。

1988年6月22日于武昌

前言

(一)

古训云：“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是故改革家王安石不无感触地发出了肺腑之言：“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①教育在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大概是中国以“文明之邦”、“礼仪之国”驰名于世界的原因之一。古代教育能收到如此巨大的效益，教育管理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的教育管理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形成了许多独树一帜的特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对促进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达，对推动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兴旺与进步、团结与统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它辐射到欧亚各国，使诸国无不为之倾倒。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还一直是西方热烈向慕和赞颂的国家。譬如，18世纪法国学者福祿特尔（Voltaire）说：“人类思想的确不能想象出比中国更好之政府。”^②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在所著《百科全书》中说，中华民族“无论就其古风、就其精神、聪明才智、文学艺术之进步以及政治哲学等方面而言，一致公认都较亚洲所有各民族为优秀。而且据若干人判断，堪与欧洲最开化的国家相匹敌。”^③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学校制度备加赞扬，称颂之情溢于言表。我国封建教育管理制度延续了3000余年，其时间之长，发展

① 王安石《慈溪县学记》《临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0页。

②③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第405页、406页，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七十一年一月版。

之充分、完备，在世界教育管理史上是绝无仅见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教育管理都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老期后，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窘境之中，中国教育管理因蒙受巨大挫折而一度落伍，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刻苦求索，仍然有新的建树，积累了新的经验，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这些，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管理学科建设，以及参与当今全球性的教育竞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所以，为国家教育前途计，为振兴人才计，我们要总结和发掘中国教育管理的历史经验，深入教育管理史的“宝山”探宝。这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义举了。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已别无选择地摆到了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面前。任何推诿都有负于我们伟大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几乎普设了教育管理专业和自学高等教育教育管理专业。但迄今为止，尚未能开出《中国教育管理史》课程，更谈不上写出专题研究中国教育管理史的著作及教学用书。这不仅与享有丰富的教育管理文明的中国不一致，也人为地给当今的教育管理改革和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添置了屏障。此书的撰写，无意于去刻意填补中国教育管理史的“空白”，只是免除在当今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管理学科建设面前的一个“负心汉”形象的种种负疚。尽管明知困难重重，千难万险，甚至吃力不讨好，也要斗胆来作一尝试。

(二)

教育的概念，目前国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教育管理是指国家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对于各级各类教育的管理。具体言之，是从事贯彻教育方针，推行教育法令，审核教育经费，拟定教育规章，编制教育计划，任用教育人员，视察、指导、考核所属机构诸人员，实现组织、计划、决策、指导、协调等职能活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管理的研究，再一次证明，过去了的并非死去了的，从贯彻中央政府的教育宏观管理政策到实施封建帝王的教育教

谕；从制定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到任免教育管理官吏和教官等，有许多东西引人深思，给人们以启迪，从中可以吮吸到丰富的营养。

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管理很明显地受着彼时彼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影响，说它是当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附庸，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算过分。国家经济繁荣，教育管理职官待遇优厚，那么，教育管理人员便忠于职守，以培育天下英才为己任；国家经济萧条，各级官吏俸薄位卑，教育的管理亦将混乱不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大。在封建社会，政教不分，政治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回事。这种体制，大概从秦代开始形成，汉唐以后成为永制。教育管理成了国家求得长治久安的手段和措施；教育管理官吏也纳入国家官制系统，享受国家官吏的待遇，也由国家主管部门负责考核其教绩，以定升降沉浮。因而教育管理效益如何，与国家实行的官吏制度关系甚为密切，教育管理职官素质如何，与政府官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国家吏治清明，教育管理职官也就廉洁奉公；相反吏治昏暗，他们也就徇私舞弊，交结私党，学校考试和科场考试，也将随之弊窦丛生，乱不堪言。

封建社会的这种教育管理体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因为教育及其管理成了一种工具，这样提高了教育和教育的地位，这不仅是通过教育宣传政府的“德化”，统一了思想，同时教育也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官吏，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从而促进了教育管理的完善和提高。其不利的一面，就是使教育和教育管理成了襁褓中的婴儿，没有丝毫的独立性，其弊不拨自明。所以，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欲进行教育管理改革，必须借助君主手中的权力，否则将是一筹莫展，寸步难行。因而又为教育管理发展加上种种绳索，人为地设下许多路障。

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是一种狭隘的、野蛮的政治制度。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发展得极为充分而完备。受其影响的教育管理制度，也与它一样得到了同步发展。这使不少西方人

叹为观止。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认为，“中国的政府制度是东方各国中最优越的制度。”但它发展得愈充分，愈完备，现代教育民主管理的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愈来愈困难。譬如，封建专制统治者在推行科举考试的同时，还用封建教条和八股文来缚士人的思想，并且还屡兴文字狱，对统治者稍有悖违就毫不留情地镇压，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在教育管理中几乎戕害殆尽。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封建帝王掌握有教育管理的生杀予夺大权。教育管理往往因其一句话，一道“圣旨”而兴盛一时，也常常因其脸色一变而大伤元气。所以，封建社会教育的另一特征，是其成为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附庸。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社会。它统治中国社会长达2000余年。儒家思想留存在人们心灵深处，积淀愈来愈厚，整个封建社会的士人，乃至凡夫俗子，其知识结构、行为模式、习俗规范，无不与此相关联。儒家文化还决定人们的伦理价值取向。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单纯是一种学说、一种知识系统，它还体现在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管理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教育管理制度到教育管理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烙印，乃至教育管理的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涂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的色彩。譬如，历朝所制定的学规学则，都是以“教化”为主，以儒家伦理为其原则规范和行为标准，以尊师重道为其主要内容；不少书院的学规，更以儒家人物的语录为其条款；明清时期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所强调的无非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即使是国家对教育管理职官的任用，也是体现了这一原则规范的。儒家思想作为教育管理的指导思想，统治者要求教育管理职官学习它，但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掌握它，而是必须身体力行，视之为立身处世的原则。这种强调身体力行的管理思想，根本旨趣在于要人们将儒家道德规范变为道德实践的兑现。所以，儒学教育管理制度化，教育管理

① 参见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第389～414页。

制度伦理化,构成了封建社会教育管理的总体特色。

(三)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包括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由此出发,教育的管理则是对这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计划、组织、实施、监督、调节和控制等。那么,我们的教育管理史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对象,应如何下笔呢?这个体系应如何建立呢?

我想,首先要把中国教育管理史分成前后性质有所不同的两部分,前部分为学校教育产生以前。关于前一部分,没有正规的学校(尽管出现了学校的萌芽),也不可能有学校的管理。因而对原始先民的教育管理的研究和探讨,只能建立在广义的(生活的)教育管理的基础之上。如原始先民对生活经验传授过程的管理,对青年一代学习和掌握获取生活资料技能的管理等等。出于这种考虑,前一时期的重点写社会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管理。而后一时期的重点无疑应是学校管理。学校未萌芽,只不过是教育管理的形态不同而已,如果因此对前一时期的教育管理缄口不言,显然这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研究前一时期的教育管理,对于弄清教育管理及其体制的来龙去脉,也是必不可少的。

学校教育产生以后,教育管理研究的重点就应该转移,探索的中心问题便应随之转入学校教育管理,重点应是认真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学校教育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以资借鉴。这是因为培养人才的场所已不再是原始社会的具体生活场景,传授知识和经验的主要途径已不再是具体生活实践、实地观摩了。学校成了培养人才、传授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场所。当然,原始先民培养年轻一代、传授经验的途径和方式,在学校产生后并没有随之泯灭消失,而是在广大的民间广泛地存在着,流传着。譬如,艺徒制就是其存在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于这些残存着的、古老的教育方式的管理,我们进行研究是责无旁贷,但由于种种原因,遗留下来的资料惊人的匮乏,给研究和探讨带来诸多不便,只有存而不论。而且,就教

育管理发展前景看来,学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恐怕还是培养人才、传授知识和经验的重要场所。所以,在学校教育产生之后,教育管理的研究重点,应明智地转到学校教育管理研究方面来。

学校产生后,学校的性质并不是纯而又纯,整齐划一,同样是各具姿态。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管理的逐渐完善,出现了各类不同性质的学校。就其主管部门而言,有中央官学、贵胄学校、地方官学、私学等;就其程度而言,有国家大学程度的学校,有专门学校,也有小学程度的学校。就其学科性质来分,经学方面的学校有太学、国子学、地方州府县学;史学方面有史学;文学艺术方面有文学、鸿都门学、画学、书学等,此外还有崇玄学、总明观、尔雅馆、士林馆、律学、算学、武学、医学等等,又有一种特殊学校——书院。对于如此类型众多的学校的管理,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就其学生来源而言,从汉朝开始,首开留学生教育之先河。因而教育管理不仅只涉及中华民族,除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民族政权派遣子弟来京都太学求学外,邻国百济、新罗、日本、琉球等也先后派遣学生来中国留学。

现实教育问题的庞大复杂化,促使着封建社会各类型学校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了更便于总结各种类型学校教育管理的经验,本书将学校分为中央官学(国子监)教育管理、地方官学教育管理,贵胄学校管理,私学和书院教育管理几个“块块”。然后,对各部分的内部管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学校内部的组织机构、教官选聘与任用、教学组织形式与考试、学生(包括留学生)和经费管理等,均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因为各个朝代的情况不同,所选取的重点亦有区别。在汉代,中央政府经营的“重点”学校是太学,遂将太学的管理作为该朝代研究的重心。自从唐代以后,国子监成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也是全国最高学府,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行政机关,同时还是培养人才的实体机构。国子监的管理,最有代表性,也最能代表当时学校教育管理理管水平,也为后世创造了一整套学校管理的经验。不以国子

监管理为主线扩展开去，于理不容。但各个朝代除教育管理上有一定的共性之外，也不乏一些特殊性。对于某些有个性的东西，自是珍贵的教育管理遗产。如，宋代学校教育管理改革，甚有特色，有不少东西发人深思，给人们提供了一条明晰的思路，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学校教育管理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与当时社会其它政策和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管理的，是国家的教育行政。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直接秉承中央政府之旨进行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它通过贯彻国家、皇帝的教育指令，推行国家教育法令，拟定学校管理规章条例，任用教育管理官吏等手段和措施，影响和控制、管理各级各类学校。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行政职官。从汉代开始，尤其是隋唐以降，教育行政职官愈来愈受重视。中央朝廷对于祭酒、司业之职，是不轻易授给的，“非其人不授”，认为它最能体现国家教化，最能影响士人民心的。要求祭酒、司业既要是国家儒学研究的权威，同时也应是“品行可称”者。孔颖达、韩愈等出任国子祭酒，便是一明证。对于其它教育行政职官亦“严其选”，不但有十分具体的聘任要求，其最大的特点是教官的“知识化”，必须从进士（或举人）中选任，而且由吏部每年对他们考核一次，每三年大考一次，国家将几次考核成绩综合起来，据此决定其去取、升降、赏罚等。国家教育行政职官考核的经常化、制度化，给教育管理带来勃勃生机。封建统治者的如此许多做法，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中国封建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是以简单实用为原则。除了宋代中央政府机构臃肿，彼此职责不清影响到教育行政机构也叠床架屋外，其它诸朝代教育行政机构是比较精简的，各自的职守也较清楚。一般说来，中央政府设置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是在隋代。这就是隋代中央政府设置的国子学。唐以后设置国子监（有时称谓不同），总摄中央七学二馆。自此而后，历代相沿成习。但这虽名之曰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却不是我们今天所理

解的含义。它与今天之国家教育委员会有很大不同，主要之点是，它有双重职能，既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同时又是最高学府，它办有“样板”性的学校。国子监祭酒既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又是大学校长。第二点不同，是它名之曰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并不是统管全国各级各类教育的行政部门，而是只管理中央政府办的大部分学校。它与中央政府所办的胥吏学校，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与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以及地方学校，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也没有对地方教育行政长官的任免权。中央最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地方仅存的一点关系，就是地方官学按一定时期向国学监所属的学校输送才思敏捷、天资聪颖的生员。这种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现代教育行政部门—学部诞生后，学部才有统摄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学校的职能。

在分析和论述教育行政时，也是分“块”进行的。它涉及国家文教政策或教育宏观管理政策、学校系统、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教育行政职官和教官的选拔、职责和待遇等问题。这些在各个朝代的表现，既有沿袭的一面，也有改造和翻新的一面。它并不是在某一朝代形成或确立就永葆美妙的青春，各个朝代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损益。下一个朝代所实施的教育管理是对前朝的扬弃和发展，并不是生硬照搬。

照一般道理说来，教育管理史似乎就写以上所述之“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两部分足矣。但依个人浅见，仅此两大“块”，并不足以回答国家教育管理政策和制度，乃至教育行政管理系统形成的动因问题，也不能从更深的层面上解答学校设置、教师选拔及职责、待遇、学生考勤、考试、学籍管理、毕业后授官之所以如此的问题。这样，逼迫我们不得不向教育管理的更深一层次进行探索。在这一层次，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决定教育管理取向的人才选拔制度——选举制度；其二是在彼时彼地教育管理实践基础上抽象、概括、系统化了的而又反过来左右着和

指导着教育管理的理性认识——教育管理思想。

选举制度与教育和教育管理是同时诞生的。原始先民就有选举活动存在，商周奴隶社会实行的是选举制的变种——世卿制，战国时期实行的是军功制，两汉时演为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再度演化，变为九品中正制。在此时的选举制度，与教育管理保持有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形成凌驾于教育管理之上的制度。到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中国教育管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事变——科举制度产生了。科举制度与隋以前实行的选举制度一样，也是一种选才制度。但它们之间很大的一个不同点，这就是科举制度是以文分科取士。它一跃而凌驾于教育管理之上，对教育管理有巨大的摄制力，有神秘的指挥棒功能。科举制度的产生，使教育管理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教育管理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士人举子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中进士人数愈多，教育管理的效益也就愈高。学的办法来自科举考试办法；教的办法取自科举考试办法，管理手段和措施亦模仿科举考试办法。《明史》之《选举志》开宗明义：科举必由学校。但其结果刚好相反，是学校必依科举。科举兴，学校盛（主要指官学）；科举废，学校亡。教育管理所以兴、所以衰，全取决于科举。科举不是教育管理自身，但它是与教育管理关系最密切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对教育管理进行遥控的巨大系统。因此，对教育管理的研究，是不能把它与科举考试割裂开来的。1905年，清朝政府明令废除科举制度。这样，影响和摄制教育管理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从制度上是废除了，但其影响的肃清，恐怕不是如此轻而易举的事情。今天，探讨教育管理与科举考试的关系，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教育管理思想，是教育家对于教育管理思考的结晶，也是教育家对教育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它是中国教育管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先圣先哲”，其思考以及其认识，往往有预见性和超前性，因之对教育管理具有一种指导、调节、控制的功用；作为教育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对于当

时教育管理的实施情况，也有认识意义。但教育管理思想起研究来，难度实在不小。其主要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多把毕生精力集中在阐释儒家文化思想和发掘儒家教育思想上面，忽视了对教育管理的研究，从而教育管理思想显得较为贫瘠，与发展得极为充分而完备的教育管理制度相比，很明显是不一致的。但愈是如此，愈是有研究的价值。

我想，中国教育管理史就依以上所言之教育行政、学校管理、科举考试制度和教育管理思想“四大块”布局谋篇，不是不可以的。记得一位伟人曾说过，最蹩脚的体系，终归是一个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漏洞百出，总算为完善它提供了一个基础，算是大胆地作一些尝试吧。

(四)

中国教育管理无时不在连绵不绝地演变。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中国教育管理史没有采取一般史书的分期办法，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其一，历史是一条源远流长的长河，尽管在某一时期九曲回肠，但前后没有本质的不同。因而欲“抽刀断水”是不现实的，也是徒劳无功的。尽管是按重大的教育制度的创立，或是以教育管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界碑，也是不尽科学的。

其二，中国教育管理代代相因的特点比较明显，彼此构成了一种渊源关系，要生硬地将其断开，是不合适的。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刘彻所采纳，自此以后，它一直是教育宏观管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的“半部《论语》定天下”、“宰相也要用读书人”与“独尊儒术”相映成趣，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到清王朝寿终正寝，历时将近2000年。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时期，恐怕意义不大；如果进行分期的话，怎样动手是好？再如，科举制度以隋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发刼，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历经1300年。如果笼统地称之为“科

举时期”，不是显得过于“粗”了些吗？那么大业二年以前可不可以大而化之地称为“选举时期”呢？显然也不够恰切。如果把科举制度进行分期，称隋唐为创立和发展时期，宋元为完备严密时期，明清为腐败时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举制度在一定时期的特点，但不仅失之偏颇，也过于武断了。

其三，叙述中国数千年的教育管理的演变，欲勾勒其变化运动的轨迹，欲其比较明晰而严密，是不能采取分期办法的。教育管理的演变有其绵延性，后一个时期总含有前一时期的余波；前一时期也总孕育着后一时期的萌芽，势不易截然地分割开来。中国教育管理史上，乃至世界教育管理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办大学——太学，虽创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但若追根溯源，乃为殷商时期所谓“右学”的发展。作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设置，是隋朝的事情，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蕴含着其萌芽。西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始设国子学，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以教生徒。北齐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年）改称国子寺，实为后世国子监的源头。

正是出于以上三种动因，中国教育管理史未采用分期形式撰写，自以为按朝代分年叙述更为客观一些。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本书只涉及辛亥革命，称“中国教育管理史”，我以为是不可以的。以后学有余力，再奋力续写。

然而，为了便于把握中国教育管理的精髓，从更高一个层面上掌握中国教育管理发展的脉络，因而在此阐述一下对教育管理分期的浅陋之见，对掌握中国教育管理之特质，可能是有所帮助的。

综观中国教育管理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探索其所依托的广阔的社会图景，大致可以粗略地分为四大时期：自有史时代至战国末，为第一时期；从秦统一六国到北周覆没，是第二时期；从隋统一中国到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为第三时期；以后为第四时期。